

## 一 白鸟库吉史学中的中国与日本

### （一）青年时代与帝国大学

#### 白鸟史学的评价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开拓者，他又使日本东洋史学登上了“世界东洋学之列”。他所建立的白鸟史学与内藤湖南的史学一起，对日本东洋史予以很大影响。

松本善海曾就“改写国史”这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相关问题论述了东洋史学的正确方向（松本善海《中国社会史的新课题》载《史学杂志》58 编 3 号，1949 年）。他认为：（一）在东洋史学中，汉文文献未言及的印度史不作为研究对象。有关日本古代史，在中国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所以成了东洋史学的研究领域。（二）关于塞外民族的研究，有中国和西方的史料，但这两种史料有各种出入，因此弄清这两种史料的是非，解释史实问题，有推理小说式的乐趣，并且最能表明史料使用水平的高低，所以塞外民族史的研究便成了东洋史最热的研究领域。（三）仅以技术处理史料无济于事的近代史研究受到轻视，他列举了这样的理由，他说东洋史学是“处理汉文史料这种需要特殊技术的，也不同于 sinology 是很不可捉摸的学问”。他又认为，东洋史学研究不是过分地以中国史为中心，而是过于以中国史料为中心。他说：“为了确立科学的历史学”，把主要从技术方面保持独立的东洋史学，在研究方面也和教育一样必须加入到历史学中”<sup>〔1〕</sup>。

松本善海所指出的，是对于他所毕业的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

学作为潮流而存在的传统学风的批判，同时也是为建立科学的东洋史学研究而作的自我批判和决心。正如松本评为“行会”那样，由白鸟树立的学风是由其后继者师徒相传地继承下来的。其例证就是白鸟所划定的东洋史学研究领域被顽强地保存了下来。白鸟史学对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的方向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而且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占有决定性地位。

尽管如此，奇怪的是白鸟的成果即其全集最近才出版（全 10 卷，1967—1971 年 岩波书店 以下简称《白鸟全集》）。而对白鸟学说的系统批判却几乎没有进行。即使在谈论日本近代思想史时，也几乎没有提到白鸟库吉。最近出版的朝日 journal 编《日本思想家》之 1、2、3 及竹内好和桥川文三所编《近代日本和中国》（上、下）筹书中出现了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矢野仁一等东洋史学者。但编者却没让白鸟库吉登台。增渊龙夫以《日本近代史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历史意识和国际感觉》为题讨论问题时，所提到的也是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两位硕学。

在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开拓东洋史学的第一个人，至今其学风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白鸟库吉，受到我国史学界的忽视，是什么原因呢？若借用逆说性表现来说，我认为白鸟受到日本史学界忽视这件事，说明白鸟史学的性质有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新的学问是在批判和克服旧学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的。对于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这三个人中，最早进行批判的就是对津田左右吉的批判，而且有许多批判和探讨者，这是由于人们期望他确实有那么多的成果。这不外说明，在研究人员中批判和克服津田左右吉、树立新的日本古代史研究形象这种历史意识非常强烈。与此相反，白鸟的业绩受到很高的评价，可以说津田左右吉是通过对白鸟的批判来建立其学术体系的。反之，以白鸟库吉的祖述者为己任的东洋史学者，却不是批判和克服白鸟史学，而是以继承白鸟史学为目的的，这就是未能批判白鸟库吉的第一个原因。战后日本的东洋史

研究，主要是白鸟很少涉猎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这又是未能批判白鸟的另一个原因。并且如后所述，白鸟是热烈的皇道主义者，这也是人们回避白鸟的第三个原因。即使如此，我认为未能批判白鸟的最大原因，是东洋史研究人员对树立一个新的研究意识很薄弱。我认为，应该重新肯定松本善海所表明的树立一个科学历史学的决心，也为了使旗田巍的危惧感（《日本东洋史学传统》载《历史学研究》270号，1962年）不能变为现实，批判和克服‘白鸟库吉’的史观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把旗田巍对白鸟是殖民地体制的参与者这个指责进一步推进，从弄清白鸟史学的本质问题开始，作第一步工作。

### 白鸟库吉的身世

白鸟的传记有两篇：一是从明治20年代起<sup>〔2〕</sup>有40余年的师弟和亲友关系的津田左右吉所著《白鸟博士小传》（收于《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二是石田干之助所著《白鸟库吉先生小传》（附于《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卷末）。白鸟库吉为其少年时期的友人木内重四郎所著《忆亡友木内君》（收于《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也能看到白鸟库吉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情况。特别是津田左右吉的《白鸟博士小传》中，在两人的朋友交往中津田抓住了白鸟的面貌，这些记载和津田日记中出现的白鸟的形象联系起来，特别令人感到有趣。

据这些记录来看，白鸟于1865年2月4日生于上总国长柄郡长谷村——现千叶县茂原市长谷町的农家。据说其父嘉一郎经常往返于家乡与江户或东京，他可能是开明的农民。白鸟经过邻村的寺小屋（江户时期的学校）于1873年8月9岁时入小学。其后转到曾我町（现千叶市曾我町）小学，于1879年3月进入刚开设一年的县立千叶中学。据说白鸟上学时，住宿在千叶县浜野海岸很近的渔民之家。当时，千叶中学的综理（校长）是毕业于庆应义塾的那珂通世，他兼任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那珂通世在白鸟库

吉入中学那一年 11 月转任东京师范学校训导兼干事 收于三宅米吉著《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1915 大日本图书 》第二年即 1880 年 3 月 年仅 21 岁的三宅米吉任物理和化学教师 大约任职一年 同前及《三宅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年谱 1929 年冈书院 》据说白鸟库吉的英语是在这时向三宅学习的。当时，千叶中学由于那珂通世的领导，科目中加了国文语法，在英文译读法中采用崭新的方法等<sup>[3]</sup>。白鸟库吉对语言的关心，可能是在这个时期的教育中培养的。白鸟库吉与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的朋友关系在其后依然保持下来。

从津田左右吉的《白鸟博士小传》来看，中学时期的白鸟并不是所谓秀才型的和模范学生型的青年。不过，1882 年 7 月他以优等生从中学毕业 于第二年 2 月经大学预备门（第一高中）后 1887 年 9 月，作为第一期学生入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

津田左右吉曾强调指出了白鸟选择史学科和后来他成为东洋史学开拓者的偶然性。津田左右吉进入历史学领域的决定性契机，便是他与白鸟的邂逅 参见家永三郎著《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第 1 辑第 3 章 27 页，1972 年 岩波书店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情况 津田左右吉格外感到了宿命性的东西。但是对白鸟史学志向予以不少影响的 是 1887 年来日本的德国人李斯和千叶中学时期的三宅米吉。

白鸟在大学预备门期间，在传通院三宅的家塾与友人木内重四郎及石井菊次郎等共同起居，三宅是从千叶中学时期就有志于史学研究的 1886 年他出版了《日本史学提要》（收于《文学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 1929 年 目黑书店 第一编。他说历史是“探寻社会文明前进方向的学问”；就一个国民而言 也要探寻其与周围的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然后作为世界史的一个方面来观察”等 白鸟库吉著《文学博士三宅米吉君小传》 收于《白鸟全集》第 10 卷 》在家塾白鸟与三宅共起居时，可能三宅经常谈到他的历史观，看来白鸟选择史学科受三宅米吉的影响不少。白鸟在入帝国大学时，三宅暂时中止高等师范学业赴欧洲留学，第二年春，结束了约一年半的留学回国。

白鸟入学的史学科，是聘请德国人李斯开设的，李斯是在白鸟入大学那一年 2 月来日本的。史学和地理学由李斯和坪井九马三两人教授。当然，那时的所谓历史即是西洋史，未讲授日本历史和东洋史。1869 年曾创建了昌平学校之后身的大学，1971 年废除。1877 年 4 月，将洋学校的后身东京开成学校和医学所的后身东京医学校加以合并，建立了东京大学，设了法学、理学、文学、医学等四个学部，并将东京英语学校改为预备门。这是仿照欧洲的学制，只是没设神学部，分哲学部为文学部和理学部，以教授和介绍欧美学问为目的。当时，由外国教师教授称正则，由日本人教授叫做变则<sup>〔4〕</sup>。

### 东京大学的设立

东京大学设四个学部时，特别对法、文、理三个学部的学科组织意见很多。见《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总说·文学部》，1942 年。设学部的呈文中表现出这一点：“本大学三个学部的学科应该适应我国今日之开化，不可完全仿效欧美大学。姑且大体取欧美学制，并听取穆勒氏<sup>〔5〕</sup>及内外诸教授的意见，参考斟酌。”正统派主张：“依照欧洲体制开设纯粹的专门学科，应广泛地培养鸿学。”性急派则主张：“目前对我国人民特别需要浅近的学科，以便日常之用。”于是呈文认为：“两者都失之偏颇。”依前者之说，“即使培养那种英才，毕业之后难免无生计之道。”若依后者之说，“就违背了设大学的宗旨，不仅我国将丧失产生专门学科的萌芽时机，而且最后会导致我国人智不能与各国人智并立”的结果。因此，最后还是以“不拘泥于理论高尚的一边倒，而是以不失浅近一边倒为宗旨”，广泛培养人材，播种专门人材的种子”的目的，实施了妥协案。结果在文学部设立了两个学科，即第一科 史学、哲学、政治学科，第二科 国文、汉文学科。

三学部综理加藤弘之向文部省提出的请示书中有这样一段

话：“现在文学部中特加国文和汉文科的理由是，当前的形势是学国文及儒学者如寥若晨星，今将国文儒学不置于大学科目中而永远维持下去，则自称日本学士者仅通英文而对国文茫然无知，这样就不可能称其为真正的文化精英。”因此，试图把国文与汉文并列，“使日本学士兼学英文、哲学、西洋史，以培养有用之人材”。

另一方面，第一科的史学科，于 1879 年以找不到教授为由废止，代之设了理财科。加藤弘之综理在其理由书中说，史学科“不仅要教授欧美历史，而且要调查研究本国、支那、印度及东洋各国历史，故这等教授既要通晓日本及外国的古今变迁沿革、兴亡盛衰，也要熟悉哲学，不然就不可能称之为合格的教授。这样的人材虽在内外寻找，但没有适宜者。而且愿意专修史学的学生也寥寥无几”。

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在 1877 年 9 月开始出版，与设立东京大学是同一年。该书于 1882 年重版。由于国文和汉文学科的学生寥寥无几，加藤弘之忧虑国学和汉学中中断，作为补救的办法，于 1882 年在文学部附设了以调查研究为目的的古典讲习科（国书科）。第二年又设了支那古典科（汉书科），这个汉书科继承具有经史子集四科的汉学传统，教授正史、杂史、法制、支那历史、支那法制、事实考证、文案、古今租税的征收、兵制概要、陵墓制作、答辩类、筹，但仅过两年便停止招生。市村赞次郎、林泰辅、泷川龟太郎等人在汉书课学习，落合直文、小中村义象等人在国书课学习。

### 加藤弘之的转变

设古典讲习科的前一年即 1881 年，主张开设国会论的大隅重信及其派别下野，确立了岩仓具视等人的日本主义的立宪主义方向。大概设置古典讲习科与这种潮流不无关系。同一年，加藤弘之综理认为，他一贯主张的“自治、平等、均一权利的天赋人权主义”不过是妄想。于是他拒绝再版。主张天赋人权的他初期的著作，向天下宣告了自己的转变，从正面向自由民权运动进行挑战。

加藤弘之在新著中认为，天赋人权说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妄想，他强调“上等平民（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妥当性，述说权利的起源是基于巩固的社会即国家的成立，它是掌权者为了保护人民而授予的。”收于《明治学全集·3·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加藤新说发表之前的1月发表了明治国家支柱性思想之一的“军人敕谕”，并且建议发表由井上毅作成的《宪法纲领》。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从学问上对岩仓具视等人的政府方针进行辩护，使之正当。与此同时，作为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的发言，对确定帝国大学乃至我国学问和教育方向，具有重要意义。而下了野的大隅重信则在同年10月创立了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其后，津田左右吉在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了两年。

### 帝国大学的成立

接下来在1885（明治十八）年年末，被视为美、法派的森有礼一当上文部大臣后，政府便强有力地提出仿效德国，第二年开始便采用德国学制，相继拟订、制定了帝国大学令<sup>(6)</sup>及各种学校令、教科书检制度以及师范学校教育大纲等。这是为了调查宪法到德国的伊藤博文等人，于1883年回国的结果。此后，在外国教师中德国教师的比例增大了。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教授适应国家所需学术技艺，考究其蕴奥为目的。”意思是说，适应国家所需要的学术技艺和考究其蕴奥不是并立的，而是坚决把前者当作帝国大学的第一目的<sup>(7)</sup>。1889年1月28日，文部大臣森有礼召集直轄学校校长时的训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学校的目的无需详谈，政府设文部省主学校教育之管理，借国库之资力维持各学校，均为国家，学校的目的也专为国家。如在帝国大学教务中，有关于为国家的和为学术的事情，必须以为国家的事为先，最为重视；各学校的学政，并非为学生其人，而应始终不忘为国家。此事最重要，必须严肃体会。”（前引《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总说》31页）

但是，森有礼的这种国家最优先的教育方针，对当时侍讲人元田永孚等人来说未必能够满足。他们的主张是在“爱国”之上还要加“忠君”，因此两者的对立更加尖锐了。1889年2月11日即将参加帝国宪法发布庆典的森有礼在宅院被刺客西野文太郎刺杀，从而结束了这一争执。西野文太郎所持“斩奸状”附录在1919年2月11日的《神风》25号上。石田一良在《明治时代的伦理思想》（收入于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日本伦理思想的展开》，1969年吉川弘文馆）中说：“按照尊奉皇室精神”把森有礼当作“乱臣贼子”来诛杀。其后，井上毅和元田永孚妥协，于1890年10月30日发布了《教育敕语》，确认“忠君爱国”是教育和道德的渊源，在教育中谋求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对天皇的彻底的神圣化和国民的臣民化。1891年第一高等学校教授内村鉴三对天皇的不敬事件和1892年免除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职务的事件都是彻底贯彻对天皇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一种手段，这是对天皇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的持疑者所采取的排挤和镇压的第一步。

#### 白鸟库吉入学史学科

白鸟库吉所入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就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开设的。白鸟究竟带着怎样的抱负选择史学科这一点不得其详，不过据他自己的回忆《学习院史学科的沿革》载《学习院辅仁会杂志》收于《白鸟全集》第10卷）中说：“我入学预备门（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后才第一次带着历史科这个名称遇到了历史这种东西。虽然称之为历史科，正确意义上的历史只是西洋史，而没有日本国史和东洋史。回忆当时所读教材的内容来看，在斯印敦的《万国史》中记载在世界拥有历史的只有阿里亚种族，所谓历史就是西洋的历史，东洋史似乎不能算在历史这个范畴之内的。和斯印敦的《万国史》一起我也读过富谢的《万国史》作为课外读物也读过巴克尔和吉佐的《文明史》。这些书都是在历史科中教授

的，就像在中学有历史科目那样，为的是学英语。在预备科中所学巴克尔和吉佐的《文明史》是当时我们酷爱的书，我们是通过这些历史论著开始了解到所谓历史观念的：“写年代事实的历史是和背诵年代记没有什么不同，这不是历史学。真正的历史并不把重点放在事实上，而是以理论方法了解史实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田口卯吉所著《日本开化小史》正好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世人的重视的。白鸟库吉的这篇回忆是在 1928 年 10 月发表的。如前所述，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是在 1877~1882 年间发表的，这个时期相当于白鸟库吉的小学 and 中学时期。他说：“正好在这个时期，读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恐怕这个回忆是不正确的。不过和斯印敦、巴克尔、吉佐等人的文明史一起，白鸟特别列举田口的书，表明他或许在预备科时期读过田口的著作，受到了很强的感染。

如前所述，在东京帝国大学新设的史学科中，教员只有李斯一人；而且李斯讲授三年的课，还没有涉及到近代史，勉强地讲到法国革命。因此我们仅仅学了除西洋史近代部分以外的概说之后，便当作专修史学的学士被推向社会上来（前引白鸟库吉《学习院历史科的沿革》）。最初史学科中就没有日本历史和东洋史的讲义，而在国文学科和汉文学科<sup>[8]</sup>中，由重田重礼和内藤耻叟教授国史。同一年 10 月废除了以前设在内阁的临时修史局，而在帝国大学内设置临时编年史编纂人员，编辑长重野安绎、编辑久米邦武、星野恒等人就任文科大学教授。翌年即 1889 年 6 月新开设了国史学科。由此看来，开设国史学科同发布帝国宪法不无关系。当时的帝国大学总长渡边洪基在建议中曾谈到他这样的抱负：“我帝国大学自东京大学成立以来没有讲授与研究本邦地理及历史，这是一大缺陷……吾国现改良文物制度，建立独立不羁之基础时，不设构成其基础的国史学科是不可能的。故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设史学科，聘请精通历史的学者教导学生；在史学中对我国所需重要事项进行调查，以补充我国政治经济之所需。”并且他在设史学科时

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使内阁临时修史局的工作隶属于历史科，在其结束以前，史学科所需修史局的官吏要移至大学”（参见前引《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文学部》第3章《国史学科》）。重野、久米、星野等人就任文科大学的教授就是根据这个建议。修史局是在1869年设置的，开设修史局时天皇给三条实美所下命令书中载：“修史是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三代实录之后无继，岂非大缺陷也。今改镰仓以后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设史局，以继祖宗之芳迹，欲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由此可见，设修史局的目的就是“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而萨摩藩的儒者重野等人就任修史局的工作，把修史局移交到帝国大学，由国史学科继承下来。

### 史学会的创立

开设史学科时，回答渡边总长咨询的就是史学科的讲师李斯。同年创立史学会时，李斯也提出不少意见。史学会的第一代会长重野在史学会创立大会上的致词中说：现在“创立这个会，就是要依据历来修史局收集的史料，参考西洋史的考究方法，考证我国史事和编纂国史，欲裨益于国家”。

关于历史学，重野又说：“如诸君所周知，近来人们感到了解世界历史的必要性，有些人在杂志上登载各种论说，但其观点多偏颇，失之公平……历史是描写时代情况的，因此对时代情况加以考察，证明事理乃是史学的要旨。”他认为把“就证、加按、据事直书”应该当作史学家的心得（重野在《史学会杂志》1号所载《从事于史学者，其心必至公平正》，1989年12月）。在重野的这个致词中可以看到，他未必仅仅重视君臣大义和把儒教式名分，将其当作专一客观主义并重视李斯所谓的“西洋历史考究之法”的萌芽。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不久便受到了“抹杀博士”的非难。

### 日本旨意和历史学

史学会的创立和《史学会杂志》的发行<sup>[9]</sup>是适应这个时期剧烈的言论活动和杂志、报纸等的出版的。1886年12月,由内藤耻叟、市村赞次郎等古典讲习科出身者创刊了《东洋学杂志》,这前后的同年4月创刊了《人类学杂志》。1887年2月创刊了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同月又创刊了《哲学杂志》、《国家学会杂志》、《反省会杂志》(《中央公论》的前身),1888年4月创刊了志贺重昂、三宅雪岭、杉浦重刚等人的《日本人》、7月三宅米吉主办的周刊《文》等杂志相继创刊。并且,1888年1月发行了《每日新闻》(改《东京横滨每日新闻》)、4月发行了陆羯南主办的《东京电报》(翌年改为《日本》)等新的报纸。这些报刊杂志和以前的报刊杂志一起提出各自的主张,摆开了辩论阵势。内藤湖南“逃出”故乡秋田上京时正好是白鸟库吉入帝国大学的1887年8月。不久,内藤湖南便帮助编辑由大内青峦主宰的佛教杂志《明教杂志》从此他便投身于写作事业(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1973年中公新书)

创刊当初的《史学杂志》上热烈讨论了历史论。在该杂志创立大会上白鸟被选为委员。他在《史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布律斯的《历史与地志的关系》的译文。翌年2月发行的第3号上刊登了白鸟的题为《历史与人杰》一文论述了人杰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青年历史学家白鸟面貌的一端,但这些文章的内容与后来白鸟的情况关系不大。

对于《史学杂志》热烈讨论历史论的情况李斯表示了疑虑。他在《有关编辑 史学会杂志 的意见》(载《史学会杂志》5号小川银次郎译,1890年4月)中说:“我看已出版的杂志3号该杂志所载论及史学高深问题,这种问题的文章比欧洲杂志一年发表的文章还多。我不说这种一般哲学的议论没有功绩,并且也不能就这些各种问题一一提出功过是非的判定。但是,退一步说这份杂志将来是否仍需

要继续登载这些问题的论文，我却抱很大怀疑。”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议论是不能“仅仅填补几页空白就能解决的”，在现今日本的情况下，这种抽象的有关编辑问题的议论，姑且让给后世来做”。他还提醒大家办杂志应注意这样的问题：（1）登载书评；（2）发表有关日本历史材料的收集，材料的年月日、地点、目录及其解说和考证等；（3）还要刊载旧记实录的书名和古文书的考订等文章，而他则喜好德国的《档案》和英国的《皇家历史报告手稿》的编辑形态，希望“利用欧洲各国多年经验的结果……要注意史学基础杂志的结构”。这里表明了对于 18 世纪末启蒙思想家们史论风气的历史叙述方法，传达了李斯继承所谓历史批判方法的确立者郎奎和尼布尔等人的学风。

#### 田口鼎轩

有关历史编纂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议论不只是在《史学会杂志》上进行的。晚年对白鸟库吉有强烈印象的田口卯吉就是其论者之一。他著《日本开化史》之后，于 1883 年又著《支那开化小史》。仿巴克尔和吉佐积极研究文明史论，于 1888 年发表了《历史概论》（《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 1 卷，以下简称《田口全集》）。田口在书中认为，自古以来在东洋的历史叙述方法即编年和记事这两个形式中，前者是“将无关的各种事件按年月区分记载的”，其结果“历史便成了恰似疯癫白痴者谈话之类的东西”，因而必须排除它，而后者则“因记载一个人的事而虽有巧拙，却无缺点”。除这两者之外，还有论述整个社会事件的史论体。他认为所谓史体论就是：（1）建立正统和非正统曲直的标准，论述事件的形式；（2）不加任何议论而仅仅说明事件与事件关系的形式。田口认为，后者是客观的历史论，是优秀的历史写作法，这就是“开化史体”。这是“有关涉及整个社会事件，对照原因和结果来记载的”。他又在同年发表的《西洋和日本》（《田口全集》第 2 卷）中说：“我曾写过日本开化的性质及方法论，记述了西

洋的开化是平民性开化，日本的开化则是贵族性开化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打破贵族分子，发展平民性因素，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许多辩论的。虽然如此，我知道什么都是西洋的这种说法决不是正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把我国变成西洋式国家，而是要促进我们的幸福。由此可见 田口是平民改良主义者 他与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相比，更站在主体性立场上。从史学会创立当初他就是史学会的成员。1891年6月他在史学会月例会上作了题为《史癖是佳癖》的演讲（《田口全集》第1卷）。他说：“日本人有史癖 但他们以本邦历史不好为由，专门以研究外国历史为乐。因此要使他们对本邦历史感兴趣是学者的共同任务。”他又说“不懂文字的‘下等社会的人’喜欢听讲和谈话，可知日本人有史癖。但是中等以上的懂文字的人则不听讲谈 他们读的就是《史记》、《汉书》、《左传》以及西洋历史之类的书，所以他们对日本历史的知识很窄。由于这个缘故 历史学家必须写有趣的日本历史 使他们去读它。田口又在《官私学校中要认真研究日本历史》（《田口全集》第1卷，1891年）一文中说 在学校教育中必须设置日本历史课 并亲自发刊《史海》杂志，普及历史知识。

坪内逍遥等人所编辑的《早稻田文学》评论这些历史学家的倾向认为：第一派即旧派，其中国学者居多，他们对上古和中古颇详；第二派就是文明史派，他们模仿巴克尔和杜莱的趣旨，但并不一定熟悉本国的历史；第三派就是受李斯的熏陶或者有自己发明而并取第二派之长处者。科学的文明史派或折衷派如重野博士等人第三派亲近 人称他们为好古派的史学家 田口《读早稻田文学的史论》，1891年，《田口全集》第1卷）陆羯南也在报纸《日本》上分三次连载《历史家及考证》（载于1890年3月12、13、14日收入于《陆羯南全集》第2卷。以下简称《陆全集》）他在该文中说：“有人以傲慢态度 俨然以史家自居，要以考证之说轻易地一笔抹杀国史上的圣贤忠孝之伟绩，这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目前这样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文学

博士、学士会员、文科大学教授重野安绎氏。”他指责重野把在樱井火车站楠公父子诀别的史传当为虚传，把儿岛高德视为架空的人物，抹杀了平重盛兵谏孝死等事件以及抹杀振兴日本魂的史话。陆羯南认为，在史学中虽有必要进行考证，但他断言重野的考证“并不是用汉学流的头脑来学习西洋流的形式。而是不投靠任何学派的重野博士一家独特的新发明”。陆羯南在《日本》创刊时发表主张：“我以为错误就是这个极端的西洋主义 其理由无他 我相信这种醉心于西洋的作法对我国不利……我不是把西洋事物只当成西洋的东西来采用的，而是因为它对日本的利益和幸福有益而采用的。在西洋好的事物移到我国不合适的，就应该将它弃之不顾。”（陆羯南《所谓日本的表题》载于 1889 年 2 月 11 日《日本》又收于《陆全集》第 2 卷）陆羯南与前述田口卯吉相比，民族主义倾向更强，是明治 20 年代日本主义思潮的代表性思想家。在他的眼里，有“抹杀博士”雅号的重野的历史学不过是个反日本的洋迷史学而已<sup>〔10〕</sup>。

#### “久米邦武免职事件”

陆羯南的主张发表后的第二年即 1891 年 10 月，和重野一起任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的久米邦武在《史学会杂志》23 号上发表了《神道是祭天的古俗》一文。翌年田口将该文转载于《史海》第 8 号上 加了这样带有挑衅性的“前言”的“后记”：“久米邦武君有很多古人未曾想到的史学观点，但我对这篇文章最敬佩……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暗想，我国现今的神道热心家对这篇文章决不保持缄默的，如果他们保持缄默，那末我把他们看做是完全被屈服的人。”<sup>〔11〕</sup>（《史海》1892 年 1 月 25 日发行。《田口全集》第 2 卷）《史海》转载这篇文章成为导火线，神道家及其他人对久米进行论难，但田口对这些论难进行反驳，他在文末写道：“我与久米氏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如此，我却相信博学高才的久米氏提出这种新论点时 将它加以推敲 以讨究古史 是天下之一大快事。故而将它介

绍给神道家诸位。然而他们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却将久米氏的新论称之为紊乱国体 国家体制 秩序 损坏皇室尊严 这究竟是什么举动呢！唉！若不信以上古的神话上的人物为神灵，而说紊乱国体的秩序 损坏皇室的尊严，那末日本的神道几乎如千六百年代的罗马教矣！我不把提倡新说者都看做是异端，仅此而已。我提倡古史研究的自由，因而不得不谴责那些神道者们对这种自由研究的忌讳。我想如果他们理解《古事记》的性质，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错误。”（《告神道者诸氏》载《东京经济杂志》614号，1892年3月13日发行。收于《田口全集》第2卷）

1892年3月久米邦武被免去了文科大学教授之职。但是《史学杂志》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涉及。其后，久米邦武仍留在评议员的职位 勤奋笔耕，于1893年6月的讲演《史学的独立》（载《史学杂志》45、46号）中稍微谈到这件事。另一方面，1887年留学德国和奥地利的坪井九马三于1891年回国就任教授。坪井九马三在留学的1889年出版了比伦海姆的《史学研究方法》一书。该书受昆杜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历史学的技术性方法论，是代表19世纪末欧洲思潮的。坪井九马三的回国与久米邦武的祭天古俗论事件等积累起来，史学界从倾向于把理念与精神隐藏在背后的郎奎流派的史学逐渐转向于重视技术性方法的比伦海姆流派。

白鸟库吉怎样理解这种史学界和评论界的状况不得其详。久米事件或许使后来的白鸟走向“神典”研究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根据能说明这一点。据白鸟库吉晚年的回忆谈《重野博士对史学界的见识》（载《南国史丛》3，1938年5月 收于《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白鸟听重野的课只有一次，白鸟的意思是说重野与普通的汉学先生不同。他说：“重野并不轻视西洋进步的研究方法 他站在很公平的立场上 在史学思想上他似乎摆脱东洋而具有西洋思想。”不过 白鸟完全没有谈到久米邦武。看来在白鸟库吉的心灵深处几乎没有留下久米邦武事件的任何印象。

## 注 释

〔1〕所谓教育的面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等学校的教育中把西洋史和东洋史都作为世界史的课程。

〔2〕据津田左右吉《学究生活五十年》（《津田左右吉全集》24卷 以下简称《津田全集》）津田大约从 1892—1893 年时期开始出入于白鸟之家。

〔3〕据《东方学》44 辑所载《谈先学——白鸟库吉博士》座谈会纪要中说，白鸟的孙子芳郎谈到：“当时校长是那珂通世先生，英语教师是三宅米吉先生”，当时英语尚未普及，三宅先生把英语读到 This is a stju l 时，偶尔来参观的那珂先生把 stju l 加以纠正说，这不是叫做 stjo:l 吗？后来我仔细一看那是 cku:l。当时的英语知识就是这样的水平，祖父带着怀念之情给我谈了这些。”但是据前述那珂的传记和三宅的年谱来看，那珂和三宅似乎没有同时在千叶中学任教。如果白鸟向孙子谈的追忆是正确的，那么这就等于说那珂偶尔来访千叶中学，恐怕由于白鸟的记忆混乱而认为那珂与三宅同时在千叶中学任教。并且三宅在《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中说：“我和你转任东京的第二年当上该校的教师，成了各学科的教授。”

〔4〕据梅溪昇《雇外国人——概说》（1968 年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雇佣外国人数在 1874 年包括政府和民间共有 650 名；1873 年文部省所雇外国人 127 人；1874 年 151 人；1877 年 109 人；1882 年 53 人；1888 年 105 人；1889 年 109 人。自此以后政府所雇外国人逐渐减少。与此相反，民间所雇外国人则逐年增多：1873 年 43 名；1877 年 62 人；1883 年 234 人；1894 年 335 人；1898 年 356 人。

〔5〕当时文部省学监戴维·穆勒。

〔6〕东京开成学校用英语称为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 认为其中的 Imperial 是“官立”的意思，森氏将它译成“帝国”，自此以后便使用了“帝国大学”的名称（见《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上》，1932 年）。

〔7〕陆羯南在 1889 年 4 月 20 日《日本》60 号上提出“大学论”，认为“纯正学问在立国上是必须的一个因素”（《陆羯南全集》第 2 卷）。

〔8〕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最初设置了哲学科、文学科、汉文学科、博言学科、英文学科、德文学科、史学科等七个学科。

[9]《史学会杂志》自 1892 年开始改称为《史学杂志》。

[10]陆羯南慨叹对重野等人的“抹杀”论没有人提出异议。因此他把写《所谓日本的表题》这篇论说的情况记录下来。《史学会杂志》一号载有重野的《答 列国新志 所载草莽生之说》一文，史学会会员草莽生即尾原亮太郎以前反对重野的“古史打破主义”，发表了对重野在史学会创立会上致词的反论。

[11]田口在《史海》转载久米邦武发表在《史学会杂志》上的《神道是祭天的古俗》，在后记中又加了这样一节：“在中世传来了佛法与此同时引进了文学，我国的神道犹如夜半被搅破的梦，不可能具备宗教的形式。到后世虽有以此为宗教者，但这又如晚种的辣椒，国史是不会允许的。然而著者证明其事实不难。

鼎轩妄批。”

## （二）东洋史学的开拓者——学习院教授时代

### 学习院教授

1890 年 7 月，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史学科的白鸟，在同年 8 月就任了学习院教授和历史地理课的课长。当时学习院的院长是三浦梧楼，他和谷千城、鸟尾小弥太等将军以及西村茂树等国粹主义者和国权主义者都是陆羯南主编的报纸《日本》的有力成员。白鸟就任教授的当时，三浦正着手学习院的学制改革，在中等科 6 年、高等科 3 年共 9 年的授业时间中，使历史的授业时间最多。这一点与文部省辖下其他学校不同。这是因为三浦认为学习院是华族学校，对华族施教最好的就是历史教育。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白鸟说：“在世上人的概念中甚至还不知道历史是什么东西的时期，学习院却使历史在教授科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当时很盛行这样的主张即人格的修养要靠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课和汉文课兼有今天的伦理和修身课。白鸟是这样追述的（前引白鸟《学习院的史学科沿革》）。由此可见，白鸟对这种史观不是持批判态度的。白鸟身上共存着作为‘西洋思想’的史学研究法和作为‘修身科’的历